

知道了

傳教士書信中的郎世寧

侯皓之

西洋人着速催進京來

郎世寧是盛清時期著名的西洋傳教士畫家，其藝術表現豐富多元，採合中西畫風，開創新的藝術風格，具有極大的成就。傳教士書信中有許多關於郎世寧的事蹟，透過傳教士記述，可以側面認識真實的郎世寧及其在華生活和善良真誠的人格特質。

郎世寧（一六八八—一七六六），義大利米蘭人，原名Giuseppe Castiglione，耶穌會修士，善寫生、人像、禽獸及花鳥等，為清朝著名的西洋畫家。郎世寧十九歲（一七〇七，康熙四十六年）在熱那亞（Genoa）入耶穌會，教名若瑟（Joseph），《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載，郎世寧「曾受名師嚴格培養，在法國藝術界占有突出地位，對宗教事務的虔誠和愛好使他滿足於聖依納爵教派

（耶穌會）中助理修士的地位。」（註一）關於郎世寧師承和學習地點，學界有多種說法，有興趣讀者可以參見相關研究。（註二）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命郎世寧啟程赴華。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郎世寧與外科醫師羅懷忠（Jean Joseph da Costa, 1679-1747）抵華，廣東巡撫楊琳繕摺奏報，康熙帝硃批：「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圖一）郎世寧和羅懷忠

抵京後，由羅馬傳信部馬國賢神父（Matteo Ripa, 1682-1745）引見翻譯，覬見康熙帝，奉命學習中國畫。郎世寧歷事康、雍、乾三朝，受到皇帝喜愛，對於宗教事務極有貢獻，《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有許多傳教士談到關於他的事蹟，大致論及深受帝王喜愛、部分藝術活動、營救受難教友和開導教友等，可見郎世寧雖然教階不高，但非常活躍，在關鍵時刻發揮相當的影響力。



清 郎世寧 聚瑞圖 軸 縱173，橫86.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提到雍正帝在宮內宴請二十名傳教士，席間表示十分讚賞郎世寧。（註五）三是雍正帝透過允祥交代郎世寧進行創作，說明允祥熟悉郎世寧，《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有大量記載可以證實。此外，馮秉正神父（Joseph Francois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在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的信中也提到允祥非常喜歡郎世寧的繪畫才能。（《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三三六）

乾隆帝頗為賞眷郎世寧，經常觀看他作畫，樂於與之對談。韓國英神父（Pierre Martial Cibot, 1727-1708）在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的信中談到，乾隆帝「一登基便喜歡上郎世寧修士，還喜歡自稱是其弟子，服喪期間的大多數日子裡，他幾乎每天都要與郎世寧修士一起待上好幾個小時。」（《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五卷，頁二六二）為了近便，乾隆帝「讓郎世寧教士在他寢宮旁邊的一間屋子裡作畫，皇上經常到教士屋裡看他作畫。」（《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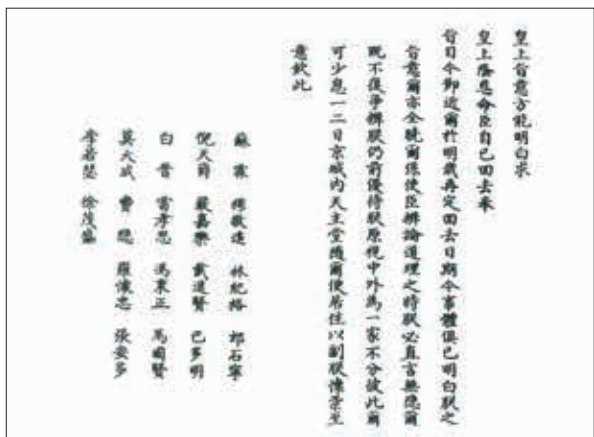
第三卷，頁一七三）乾隆帝與郎世寧互動密切而頻繁，甚為眷寵重視，外國使節也有聽聞。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巴石喀（Don Fr. Xav. Pachecoy Sampaio）使華，在使華紀實中指出：「畫畫的郎老爺，官名士寧（世寧），聖名若瑟（Joseph Castiglione），很有德的，萬歲很愛他的，他有河道雪亮藍頂戴，王公大人面前，有體面」（方豪，《中西交通史》，頁七五九—七六〇），充分顯現郎世寧的特殊地位。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寧七十歲，乾隆帝特地賜緞六疋、掛袍一件、瑪瑙朝珠一串、四字御書匾額，以獎勵郎世寧長年效力之功。

適應文化 調整畫風

郎世寧西畫技藝嫺熟，入華後，被要求學習中國畫，為了融入文化，郎世寧謙遜自抑，不以為苦，認真觀察吸收。傳教士侍奉皇帝，不能自由發揮，一切都要奉命而作。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曾描述與乾隆帝之間的互動：「我們



圖一 廣東巡撫楊琳〈為報西洋人郎世寧等並英法等國商船到粵奏摺〉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1冊，頁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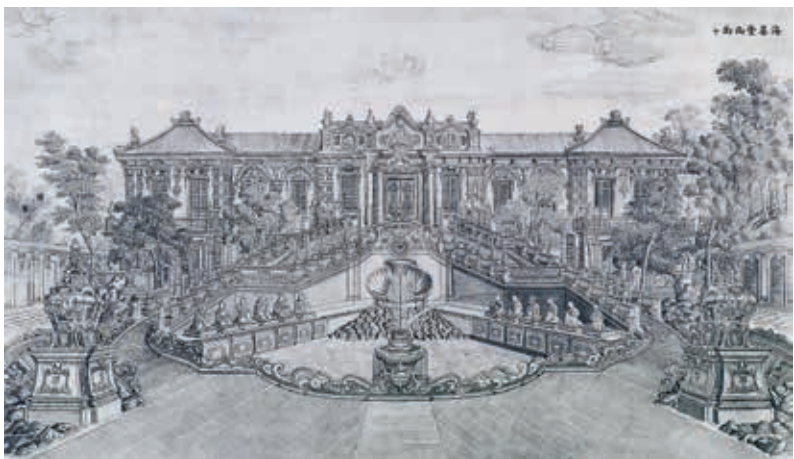
圖二 〈康熙硃筆刪改嘉樂來朝日記〉局部 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1冊，頁47。

歷事三朝 深受帝矚

關於郎世寧在康熙年間的活動，史料缺載，目前可見的有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一〇）教廷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1741）來朝日記中，有郎世寧署名（圖二）；另外，根據《一六至二十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載，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郎世寧在北京發世俗助理願，誓詞以拉丁文撰寫（註三），其記錄與宗教事務有關：大陸

學者鞠德源等在〈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文中推論郎世寧在康熙朝受命繪製油畫，顯露畫藝和才能，因而受寵。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起，郎世寧與相關藝術活動頻見於檔案。嚴嘉樂神父（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在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的信中說：「新皇帝（雍正帝）透過這位皇子（怡親王允祥）告知郎世寧，讓他畫幾幅畫，皇帝陛下很喜歡他的藝術作

品，常賜給他特別豐厚的禮物，但至今也未召見過他，也沒有和他談過話。」（註四）這段記錄反映三個訊息，一是雍正帝登基未久，即表示喜歡郎世寧的畫作，說明雍正帝在皇子時期對郎世寧作品已有深刻印象，反映郎世寧的畫藝表現在康熙朝已富有盛名。二是雍正帝不親自接觸郎世寧，但公開表示對他的肯定。宋君榮神父（Anoine Gaubil, 1689-1759）在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的信中



圖四 圓明園西洋樓海晏堂西面銅版畫 引自何重義、曾昭寶，《圓明園園林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圖5-135。



圖五 圓明園西洋樓海晏堂西面遺址 作者攝

團訪華，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指出：「一位名叫卡斯提略恩（郎世寧）的義大利傳教士畫家奉命畫幾張畫，同時指示他按中國畫法而不要按他們認為不自然的西洋畫法畫，：畫法和著色都很好，但就因為缺乏適當的陰影，而使得整個畫沒有精神，但中國人認為這樣畫法比西洋畫法好。」（註八）在歐

洲人眼裡中國畫法缺乏精神，中國人則認為中國畫法優於西畫，各從文化本位角度思考，反映中西文化的巨大鴻溝。

藝術表現 豐富多元

各種繪畫以外，郎世寧的藝術表現遍及各項工藝、設計甚至建築。圓明園是聞名古今中外的皇家園林，

其中西洋樓景區是乾隆帝敕命郎世寧設計監造，其緣起是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乾隆帝看到一幅噴泉畫，命郎世寧解釋，並尋覓能夠造建造水法（噴泉）的歐洲人，郎世寧遂赴各教堂徵詢，而後推薦蔣友仁神父帶領工匠建造。乾隆帝為了搭配水法景觀，又決定營造西洋樓歐式建築，親自選定位置，並令郎世寧和蔣友仁共同設計繪製圖樣。（《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六卷，頁六四—六五）歷經十餘年，在諸多傳教士努力合作下，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西洋樓建成，建築群包含六組西洋式建築、三組噴泉和諸多小庭院，乾隆帝甚為欣喜，錢德明敘述道：「能夠使皇帝感到高興的還有能提供更為變化多端、賞心悅目的噴射水柱，來自聖彼埃爾山谷的著名機械裝置，這些噴射水柱由郎世寧設計並監工建造的歐洲風格建築群起了裝飾作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四卷，頁五一）透過傳教士書信介紹與郎世寧繪製的西洋樓銅版畫，圓明園成為當時歐洲傳誦不已的東方「夏宮」。（圖四、五）

王致誠的抱怨亦是郎世寧此前在華工作的真實寫照，為了符合中國的審美情趣，必須調整自我，學習中國繪畫。對此，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批評郎世寧，「他雖然是一位藝術家，但為了遷就中國生活方式，變成了一個善於僅僅能低三下四模仿別人行為的人。」（《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六四七）古伯察以「模仿」形容郎世寧適應、學習、融合中國畫風其實過度指謫，實際上，郎世寧深入觀察中國習慣，掌握中國繪畫的旨趣，融合歐洲技法，發展出獨特的畫風，例如郎世寧繪製的〈聚瑞圖〉，畫中描繪

一只青瓷弦紋花瓶中插著並蒂蓮花、蓮蓬與稻穗等象徵吉祥的植物，以傳統題材為題，揉合畫風，形成極具光影效果的色彩敷設，標誌著郎氏畫風奠基與形成新院體風格。（圖三）蔣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曾記述一事，可看出郎世寧深刻把握中國美學的觀點：

一天，他（王致誠）畫了一朵花，在華已有許多年頭的郎世寧修士無意中看了一眼便告訴他這朵花邊上多了一兩片葉子，但王致誠修士道：「誰會想到去數花周圍有幾片葉子呢？」郎世寧修士道：「每位優秀的歐洲畫家都會覺得您的花畫得很好，然而此間任何一位初學繪

畫者一見您這朵花就會立即告訴您這朵花邊上葉子的數量與其應有的數量不合。」王致誠修士把他的畫拿給幾個中國畫家看後馬上相信了郎世寧修士的話。（《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六卷，頁三十一）

傳形寫真應注重真實，著重觀察，才能掌握描繪對象的形態，而非在真實形象中添枝加葉，反而畫蛇添足，不切實際。此時王致誠尚未融入文化，經郎世寧提醒，求證於中國畫家，證實確實迥異歐洲的審美標準。關於中西審美觀念的差異，英國使節也有評論。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節



圖三 清 郎世寧 聚瑞圖 軸 縱173，橫86.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帝和作為戰勝者與凱旋者的君士坦丁大帝」（《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六卷，頁一一〇）清人筆記《簷曝雜記》、《竹葉亭雜記》、《秋坪新語》、《榆巢雜識》等，均有記述南堂宏偉油畫，名聞遐邇，「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圖六、七）

伺機而行 拯救教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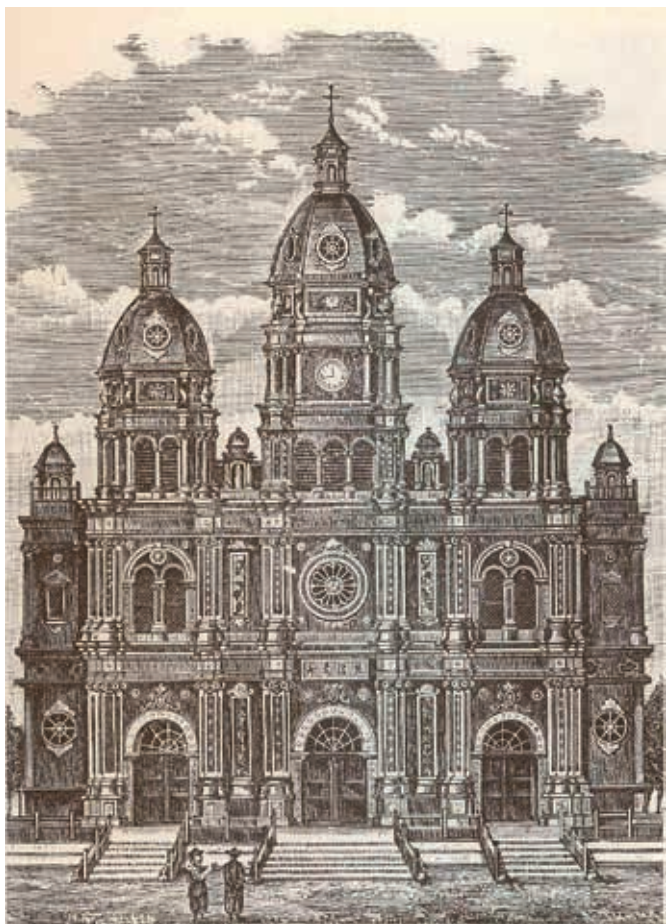
郎世寧雖以藝術表現享有盛名，然而本職是傳教士，努力的目的是為了傳教、履行神職，然而雍正帝和乾隆帝對西方宗教不感興趣，取締基督教，視傳教士為專技人員，採取用其技藝的態度，以滿足統治需求和西洋嗜好。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發生福安教案，傳教士被囚迫害。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雍正帝批覆禮部奏議，「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教案發生時，傳教士力圖挽回，透過關係設法奔走營救，但情況相當不樂觀，以致嚴嘉樂在信中



圖六 北京南堂今貌 作者攝

Parentin, 1665-1741）參觀，希望神父針對佈置給予意見。巴多明描述所見：

教堂深處，祭壇後面，有一鍍金的仿歐的裝飾屏，做工非常精巧。正中是一幅三位一體的聖像，旁邊是守衛天使像，另一邊是聖約瑟像，都上了油漆，出自一位中國人之手。但是，米蘭耶穌會士郎世寧教士作了修補，他是一位很靈巧的畫



圖七 清代北京南堂外觀畫 引自張西平，《跟隨利瑪竇到中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頁109。

感嘆：「真想不到基督教在中國竟淪落到這種地步，只靠耶穌會一名教士的畫筆才能救它」，抱怨郎世寧「不敢庇護受迫害的傳教士。」（註七）嚴嘉樂指責郎世寧既受雍正帝寵信，為何不敢出面解救。其實，嚴嘉樂批評有點過激，他知道雍正帝從未召見郎世寧，也不與之談話，當時

郎世寧縱使有心也苦無機會，而當雍正帝批准禁教後，郎世寧和馮秉正神父、費隱神父（Xavier Ehrenbert Frdelli, 1673-1743）聯名求見允祥，請

家。祭壇、跪凳、十字架、蠟燭、花瓶、鮮花、吊香爐及其他一些陳設都體現出一種典雅的趣味。（《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三卷，頁三三）

巴多明指出仿歐祭壇裝飾屏工藝精緻，上面有中國人繪製的聖像，且經由郎世寧靈巧修補，展現出典雅的趣味。根據傳教士書信，郎世寧也為北京天主教南堂繪製兩幅巨大而華麗的油畫，分別為「即將獲勝的君士坦丁

求保護與代奏雍正帝，祈請收回禁教成命，最後雖然未能轉圜，但說明郎世寧熱心參與教務。

乾隆帝多次表示反對中國人信教，表面上對傳教士態度開明，然則地方上監禁、斬殺傳教士之事時有所聞。為了維護傳教事業，教團不得不運用乾隆帝器重郎世寧的這層關係，請求乾隆帝寬容傳教士、赦免教徒，期望說服乾隆帝，改變危局。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禁教迫害又起，北京諸神父聯合上疏，請郎世寧伺機進



圖八 郎世寧墓碑拓本 作者提供

神筆丹青



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

PORTRAYALS FROM A BRUSH DIVINE:
A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TRICENTENNIAL
OF GIUSEPPE CASTIGLIONE'S ARRIVAL IN CHINA

2015 10/06 — 2016 01/04

陳列室 Galleries:
202, 204, 206, 208, 210, 212



呈。當乾隆帝一如往常坐在郎世寧身旁觀看作畫時，郎世寧突然置筆，滿臉悲傷，跪地述說教會遭難的情況並進呈奏疏，乾隆帝表示：「朕沒有譴責你的教會，朕只是禁止旗營裡的官兵進教」，示意太監收下奏疏，對郎世寧教士說：「朕會讀它的，你放心，繼續作畫吧。」（《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六卷，頁一七三）此後，郎世寧又多次參與營救受難教士與教友。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北京基督徒劉二為嬰兒施洗被求刑迫害，郎世寧與多位神父聯名上奏營救，郎世寧又於乾隆帝觀看作畫時，跪地泣求寬容基督教；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福安教案又起，旋即擴展至全國，北京教團只得再次委託郎世寧伺機呈奏。（《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四卷，頁一八五）鑑於多次經驗，宮廷禁止郎世寧等傳教士畫家向皇帝奏陳事務，但郎世寧豪不畏懼，依然兩度向乾隆帝請求寬容基督教、赦免傳教士，甚至藉由沙如玉神父（Valentin Chaler, 1697-1747）之逝，與乾隆帝解釋教義。（《耶穌會士中國書

註釋
1. (法) 費賴之著 (Louis Pister) 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頁六四七。
2. 外籍學者研究部分，請參見《十六至十七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九七—九八。另外，大陸學者曹天成在《耶穌會士畫家郎世寧研究述評》文中引用義大利學者 George Robert Loehr、Macco Musillo 的研究，對此有相關說明。
3. 同註一，《十六至十七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頁九七。
4. (捷克) 嚴嘉樂著，叢林、李梅譯，《嚴嘉樂從南昌寄給布拉格尤里烏斯·茲維克爾的信》，《中國來信（一七一六—一七三五）》，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一〇，頁四一。一七三三年十月十四日于南昌。

參考書目
5. 〈宋君榮神父致蓋雅爾神父信件〉，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一六七。
6. (英) 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上海：上海書店，二〇〇五，頁三二九。
7. 同註四。

簡集》，第四卷，頁三四九—三五〇）錢德明在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的信中說：「自傳教士在此立足以來，沒有任何一位皇帝比當今在位的皇帝（乾隆帝）更多地利用傳教士們的服務，沒有任何一位皇帝比當今在位的皇帝更為虐待他們，也沒有任何一位皇帝比當今在位的皇帝更多地壓制他們所信仰的神聖的宗教」（《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五卷，頁五一），即是當時傳教

處境的真實寫照。
郎世寧多次參與轉圜教難，數次當面懇求乾隆帝寬容，充分顯現勇敢無畏，虔誠搶救教務與生命的勇氣與毅力，正如同郎世寧墓碑的拉丁文題贊「於傳教事業極著功績，其宗教修養，亦頗昭彰」，說明郎世寧對於中國傳教事業的重要貢獻。（圖八）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